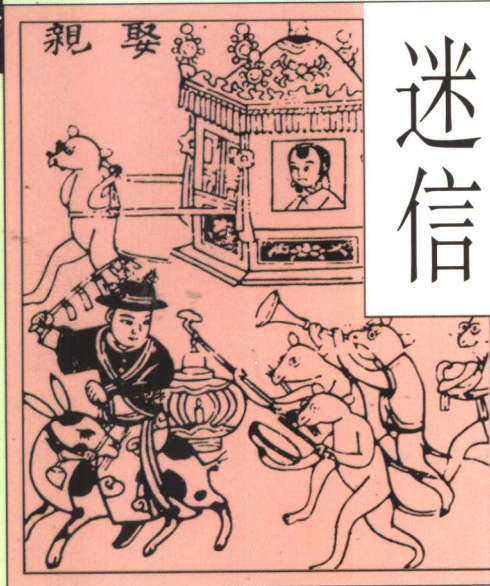




小
书



民俗与 迷信

江绍原
陈泳超

著
整理
北京
出版社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民俗与 迷信

江绍原 著

陈泳超 整理

北京出版社



小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俗与迷信/江绍原著;陈泳超整理.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1

(大家小书)

ISBN 7-200-04735-X

I. 民… II. ①江… ②陈…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中国②迷信—研究—中国 IV. ①K892②B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422 号

·大家小书·

民俗与迷信

MINSU YU MIXIN

江绍原 著

陈泳超 整理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7.5印张 119 000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 001—16 000

ISBN 7-200-04735-X

B·89 定价: 12.00元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江绍原及其礼俗迷信小品

陈泳超

—

江绍原（1898—1983），祖籍安徽旌德，生于北京。曾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因病回国。1917至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参加“新潮社”，为五四运动学生总代表之一。1920年下半年起，被选派至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系学习，后又在依利诺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代理主任、大学院特约编撰员，先后在北京女子大学、中法孔德研究院、中国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供职，解放后曾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以及商务印书馆编审等职。主要从事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曾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创设“迷信研究”课程，与钟敬文、姜子匡等共同发起成立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发表了许多迷信与民俗方面的研究文章，并出版《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等学术专著，其早



期的研究成果斐然可观、卓有影响，是我国现代民俗学奠基人之一。

江绍原当行的专业是比较宗教学，但在 1923 年回国后，他很快就将研究转移到了民俗学方面。这就被同校教员周作人引为同调了。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凌厉浮躁的健将，或者尚有因缘际会的偶遇，但他对于国民性的关注，却是一以贯之的。而要了解国民的感情生活，周作人觉得宗教最是重要，但急切不能直入，而民间传承却“正是绝好的一条途径”，所以说“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周作人回忆录》，第 662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在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写的序言中，周作人平实地记录了两人的相交到相知的简要过程：

绍原是专攻宗教学的。我当绍原在□□大学时就认识他。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是什么东西，又领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做《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翻给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Dodoitsu”，日本人用汉字写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歌。我自己是喜欢都都逸的，却未必一定劝别人也去硬读，但是绍原那种探查都都逸的好奇与好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

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绍原学了宗教学，并不信那一种宗教，虽然有些人颇以为奇（他们以得宗教学者即教徒），其实正是当然的，而且因此也使他更适宜于做研究礼教的工作，得到公平的结论。（江绍原：《发须爪》，第三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周作人在1924年11月《语丝》第一期上发表《生活之艺术》，认为中国的“礼”的本意就是指 Art of Living，只是后来才堕落为 Rite of Living。江绍原在《语丝》第三期上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周作人的根本主张虽然是极可赞赏的，但未免把“礼”太理想化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本意上的“礼”，真正合乎今人之用的礼或曰“生活之艺术”，是须得以今人的科学知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兴趣来重新研究制订的。周作人对此也很表同意。由于江绍原始终对周作人执弟子礼，两人又都有诙谐幽默的性情和文风，江绍原索性就戏称周作人为“礼部总长”，周作人也顺势回封江绍原为“礼部次长”，两人间关于“礼”的探讨和研究文字，也被江绍原戏称为“礼部文件”，共得九份，后五份基本是江绍原个人对于传统礼制的专项研究心得。这些在戏谑外衣包裹下的切实的探究，当时曾发生很大的影响，对于江绍原来说，也奠



定了他礼俗研究的基本格局。他后来赖以成名的著作《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就是在“礼部文件”之九的基础上增订完成的。

1926年7月，江绍原在代替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的时候，开始发表自己关于迷信礼俗方面的所谓“小品”，后来又在《语丝》（周作人、江绍原均为主要发起人）上接续发表，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并不时有呼应和回复的意见贡献，这对于江绍原研究的进步和兴趣的增广，是一个很大的助力。他在《语丝》155期上发表的小品《移过；移病》里说：

因为这是我的笔记“小品”第一次在中国南部发表，我想我应当把小品的范围、性质、体裁和旨趣等等，略加说明。小品不是“文艺”作品，也不是“随感”、“漫录”一流的无归宿无鹤的的杂俎。小品只是我从各种文献和地方搜集来的资料，关于我国古今的迷信、礼俗和宗教的。有些要研究的题目在心里；凡是特地找来或无意中碰见的与它们有关材料，无论怎样琐碎，我都记或抄在小品里面，有时并略加剖析讨论，有时不。至于我所以要发表它们在杂志报章上，也有用意：我想引起一些人对于迷信礼俗的兴趣，并且借此请求他们把每人所知道的性质相同或略同的东西写出来供众人研究。从我过去的经

验看来，小品的确能达到它的目的，这就是说，小品的确有人看，而且他们肯把看了之后所想起的各种传闻事实，写信告诉我。外面来的信只要其中有可采之处，我收到之后就也替他们发表出来。这些材料，不是发表之后便算完事，反之，将来我写正式的论文或专书之时，是要尽量引用的。

江绍原后来持续发表了这类小品有 550 余篇，一直延续到 1931 年前后，成为了影响广泛的“江记”报章学术品牌。

二

江绍原与周作人当初以“礼部职守”和“礼部文件”作文字往来的时候，戏噱固然是其主调，却也含有相当的现实关怀。就在 1925 年的夏天，据称有鉴于人民“或竟尚新奇、或流于简褻，内损国信、外失观瞻，有意谋整齐画一之必要”，内务总长龚心湛“拟在内部设立礼制编纂会”，业经阁议通过并组织就绪，正会长即由龚总长亲自担任。江绍原将这一消息火急报告给周作人，周作人却不疾不徐地安抚他，说该会制定的只是 Rite，将来也必然只是“一纸空文，毫无实效”；而本部所关注的是 Art，是要制出“‘活泼泼地’鸢飞鱼跃的气象之礼，与彼辈截不相同”（《周作人文类编》9，第 30—31 页，湖南文艺出版



社，1998年）。尽管江绍原并不同意把“生活之艺术”当作是“本来的礼”，但是对于“生活之艺术”的追求，他和周作人是基本一致的。而所谓“生活之艺术”，按照周作人的意思，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这话听起来无甚高论，只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微妙地混合取与舍”，的确是很微妙的。更不幸的是，这样对微妙的咀嚼，放在几个讲究情趣的文人之间讨论，以滋养些生活艺术的根苗，原本不可谓无益，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的社会当中，或者是想把这般理想化的“礼”推广为社会民众的“俗”，就不免让人立时气短起来。且看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

北京军民长官率领众和尚长跪求雨，各报均有报道，《顺天时报》并有照（周作人：《求雨》，见《谈虎集》，第214页，岳麓书社1989年）；

长辛店绅商联合各界求雨三天，其形式据《世界日报》1927年6月30日载：“是用寡妇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并用大轿抬了龙王游行，用人扮成两个忘八，各商家用水射击他，鼓乐喧天，很是热闹”（周作人：《再求雨》，《谈虎集》第216页）；

《妇女杂志》等1924年刊载某教育会联合会之议决案，要求女生一律着“袖必齐腕，裙必及胫”的制服，以防止“扬袖见肘，举步窥膝”，有伤“众流仰望”之体面（周作人：《论女裤》，《谈虎集》第121页。被江绍原列为“礼部文件”之三）；

甚至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陵墓将竣之时，社会上还谣传要摄取一千童男女之灵魂，以致宁沪一带有小儿之家人心惶惑，忙碌着各取诸物厌禳（见本书《“总理造墓须摄童男女魂灵”之谣言》）；

.....

可见，对于改造社会民众来说，恐怕更急迫的不是如何立“礼”（生活之艺术），而是破“俗”。所以，周作人说：“我相信要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教，而要了解礼教更非从萨满教入手不可”（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谈虎集》第202页）。那么了解之后如何解决呢？周作人贡献两条意见：“其一，发达上去，进为一神的宗教；其二，被科学思想压倒，渐归消灭”；并认为第二条路更彻底。这是他1920年的想法。但是到了1926年，周作人失望地说：“‘彻底’是决没有的事，传教式的科学运动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还只是普及教育，诉诸国民的理性。”（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想》，《谈虎集》第205—206页）尽管从本心上说，他对此也并没有多少信心，而且越到后来越至于消沉，但他还是很愿意看到有人来做这样的事的。而江绍原的知识和兴趣，正是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更难得的是，他比周作人要“情热”（《谈虎集·后记》第371页）得多。

江绍原关于迷信研究的宗旨与方法，集中体现于他的《中国礼俗迷信》一书里。该书原是江绍原30



年代在北京大学开设“礼俗迷信研究”课时所用的讲义，生前并未发表，后由王文宝先生整理修改，于1989年由渤海湾出版公司出版。江绍原在该书中为迷信下了这样的定义：

一切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信念以及它们并存的行止，我们皆呼为迷信，其中有一部分（或许是一大部分）普通常用“宗教”“法术”两个名词去包括。（第4页）

江绍原承认科学当然也不是万能的，而且就其历史来说，也是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的，但是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迷信是处于科学的反面，并是被科学证明为虚妄的东西。所以，他很肯定地说：“迷信研究是（对）人类文化演进程途中黑暗错误方面的研究”（《中国礼俗迷信》，第41页）。

具体的迷信研究，江绍原依循着两条路数展开：一是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揭露迷信事项的虚伪。他在小品系列里一再强调说，有些迷信在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看来，仅凭常识一望即知其为迷信，但是真要说明它的虚妄，却必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有时就非得求教于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以至人文科学工作者，甚至还可能要向不止一门科学讨教。所以，江绍原屡次呼吁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都来介入这项工作，并广

而言之说：“一切真实的学问都是涉及迷信研究和破除迷信的。”（《中国礼俗迷信》，第42页）二是对于已知是虚妄的迷信，还要努力对其产生及其被人信受的原因给予恰当的说明。正如他在《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之“导言”中所说：“在叙述的工作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将那种观念的出发点或云那种观念所以能出现的原因，也能多少加以说明。叙述了事实，然后人知科学时代与前科学时代的发须爪甲观，确是两付面孔；叙述之外又加以解释，然后人知前科学时代的这一部分思想，尽管荒诞，却不是无因而至的。”（《发须爪》，第10页）这后一种思路，其根柢还在于当时颇为流行的人类学派的理论。周作人很早就信从了人类学派的理论，对弗雷则（Frazer）的著作尤其喜爱，并借用其成果和方法来对许多现代礼俗、迷信、心理等所包含的野蛮因子予以揭示。江绍原受周作人影响，对人类学派也异常倾心，而且由于他对迷信礼俗事项钻研得更深，所以他除了一般地用我国的事项来印证人类学的理论或借用国外同类事项及心理来对本国迷信予以解说外，还能深入到那些事项的内部，发现其特殊的解说原理及其结构逻辑，这样的研究，应该说更具有学术的品格。

不止于此，江绍原的迷信礼俗研究，还具有直接的现实参与的意识，尤其是小品，天生短小迅疾，可以很快捕捉到现时发生的活生生的迷信事例，比如本



书选录的关于胡进士的传单、关于孙中山陵墓的谣言等，都是即时发生的事件，而江绍原以一个民俗学家的身份，给予了相应的分析。正是基于自己所做的这些切实的研究工作，江绍原对当时一些在表面上闹腾的所谓破除迷信运动很是不满。他在1929年2月15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說：“不彻底的破除迷信运动，早已知其不能成功。民众的程度固然不够，即领袖们亦何尝够格？”（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8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这绝非露才扬己、危言耸听。就在那一年的破除迷信运动中，就发生了不问青红皂白的毁庙事件。江绍原急切地指出，迷信虽然不应该提倡，但许多庙宇、偶像是应该保存下来供研究之用的，为此他请求身份与影响远胜于自己的周作人出来说话，认为或许于事有补（《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78页）。但是周作人并不愿意，他倒不是不赞同江绍原的意见，甚至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比江绍原还早，也更深入，问题是1929年的周作人，早已觉得有理说不清、世事无可为，而开始倡导“闭户读书”了（《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145页）。

总的来说，迷信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是科学的反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迷信也并不一定全无科学价值，个人的科学知识有限，有些被视为迷信的观念，或许倒是民众天才的科学感知，也并非全无

可能。江绍原对此也保持着一定的理解，比如本书选录的关于“月光能力”的问题，江绍原就承认里面可能有部分的真理。况且科学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对此，江绍原理论上是承认的，但是在他全部的迷信研究中，这一面却不占什么位置，这也许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偏颇。比如对于中、西医的优劣关系问题，江绍原是坚决拥护西医、反对中医的，他的小品有一百四十多篇均是所谓“国人对于西洋方药医学的反应”系列，基本都是揭露中医虚妄的言论，有时甚至是很激越的。在1928年10月8日给周作人的信中，江绍原说在医院碰到了陈万里，陈万里主张以前以中医反对西医和以西医反对中医都是错的，提出应该赶紧整理中医，但江绍原本人坚持认为“打倒中医是第一件事，打倒后再整理不迟”（《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62页）。在1929年3月8日的信中，江绍原甚至说：“现在似已有了一个癖，一星期不写一两篇骂‘反动派’（医学上的）的文章，便非常不舒服！”（《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90页）。这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偏激，但在当时，却也有相当多的同志，比如周作人。周作人在1928年8月写的《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一文，就是从江绍原攻击中医说起的。他根据英国肯斯顿博士所著《医学史》的四阶段说，即（1）本能的医学，（2）神学的医学，（3）玄学的医学，（4）科学的医



学，认定中医尚处于“玄学的”阶位，是需要向“科学的医学”发展的。这样，他认为医学只有一个，与其说是中西的差别，不如说是前后新旧的差别，中医是旧的、复古的，西医则是新的、革命的，那么中西医学的高下，就断然明确了；而中西医学的斗争，已经不光是医学问题，本质上是复古与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大问题了。这里充分体现了周作人和江绍原的气质差别：当江绍原血脉贲张地攻击中医时，周作人只是“远迢迢地望着”（以上均见周作人：《永日集》，第89页，岳麓书社，1988年）；但是当周作人开始说话时，语气上虽然仍是舒徐，似乎不如江绍原激烈雄宏，但下的断语却截然不移，也显得更有学理和底气似的。

三

最后对于本书的编选作一些交代。

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有意收入江绍原关于迷信礼俗的研究，初拟是重印《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这当然也是名实相符的。不过我以为选编江绍原的小品系列更有意思。因为《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其实也就相当于某一专题的小品的综合，虽说在整体感上比较优越，但是它的思路和论点并未超越小品太多，放大为专著，填斥更多的同类材料，反而显得比较单一、累赘。这在当时或许有其必要，但在科学更见昌明的今天，有些科学道理和